

经济增长与幸福感*

——解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

李路路 石磊

提要: 本文利用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中国为例分析了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本文通过构建一种多元分层动态的幸福感分析范式,分析了主观幸福感形成过程中多变量以及微观幸福变量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进而揭示了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本文发现,随着宏观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居民的需求类型逐渐由物质型向发展享受型升级,由个人的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幸福回报不断削弱;另一方面,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引发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效应,消除了由经济发展本身所带来的幸福回报,由此造成主观幸福感水平并没有随经济高速增长显著提升,而是呈现出相对停滞的状态。

关键词: 伊斯特林悖论 主观幸福感 宏观经济发展 需求转型 社会不平等

一、引言:伊斯特林悖论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 SWB)研究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理论热点,引发了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广泛关注,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Wilson, 1967; Brickman & Campbell, 1971; Diener et al., 1995; Easterlin, 1974, 1995, 2001, 2012; Bjørnskov et al., 2008; Di Tella & MacCulloch, 2005, 2008; Madden, 2011; Sacks et al., 2012; Stevenson & Wolfers, 2013)。研究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理论范式切入,以个体间的变异性为共同的出发点,较为全面地探索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成果在揭开幸福之谜、推动幸福感研究走向

*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读者如有问题,请联系通讯作者石磊(shilei2014@ruc.edu.cn)。

多元化和全面化等方面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也遗留了许多莫衷一是的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提出的“幸福悖论”或称“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1974)。

伊斯特林于1974年利用美国及其他11个国家的数据对幸福感做了跨国比较研究。他发现:第一,在一国之内,富人报告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穷人。第二,从跨国比较看,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第三,从历时效应看,国家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国民平均幸福感的提升(Easterlin, 1974)。因此,伊斯特林悖论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两个相互对立但又同时成立的命题:微观命题着重探讨的是个人的收入水平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结论可以表述为个人收入的增长能够显著地提升幸福感;宏观命题关注的是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对国民平均幸福感的影响,其结论可以表述为国家经济的增长不必然会提高国民的主观幸福感(Easterlin, 1974)。

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引发了西欧、日本等诸多国家幸福感研究的热潮。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各国在历史传统、风俗民情、政治制度、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在国民幸福感水平上,大多都出现了伊斯特林所描绘的悖论现象(Easterlin, 1995; Clark et al., 2008; 邢占军, 2011; Walsh, 2012)。

然而,也有一些经验研究对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主要围绕着伊斯特林悖论的跨国比较依据和历时效应依据展开。针对前者,韦胡文等人发现,富裕国家的国民幸福感要高于贫穷国家,各国的人均GNP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高达0.84(Veenhoven, 1991)。迪纳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居民的幸福感受显著相关(Diener et al., 1995; Cummins, 1998; Myers, 2000; Deaton, 2008; Stevenson & Wolfers, 2008; Sacks et al., 2012)。针对后者,韦胡文对印度、韩国、菲律宾、埃及、尼日利亚、南非、墨西哥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居民幸福感在过去的50年中均有显著的提升(Veenhoven & Hagerty, 2006)。刘军强等根据2003-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研究发现,在过去10年间,尽管通胀水平(CPI)不断攀升,但个人的绝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一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刘军强等, 2012),也对伊斯特林悖论提出了质疑。

为了回应韦胡文等人提出的质疑,伊斯特林进一步修正了自己提

出的幸福悖论。通过对东欧、韩国、智利等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伊斯特林提出,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 U 型的变化趋势。尽管在短期内国民的平均幸福感与经济变化的变化趋势相吻合,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能够提升幸福感水平的空间仍是十分有限的(Easterlin et al., 2010)。修正后的伊斯特林悖论更加强调时期的分界因素,提高了其观点的说服力。

伊斯特林对中国的研究也同样显示,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自 1990 年以来一直下降,并在 2000 - 2005 年跌入了谷底,随后开始缓慢地回升。^①由此可见,曾经多见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伊斯特林悖论也适用于中国,只不过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才能显示出来,这一结论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支持(Kahneman & Krueger, 2006; Inglehart et al., 2008; Brockmann et al., 2009; Knight & Gunatilaka, 2011; Li & Raine, 2014; 吴菲, 2016)。

围绕伊斯特林悖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事实,即伊斯特林悖论是否真的存在,在什么程度或范围内存在。如上所述,这个方面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伊斯特林悖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是一种普遍存在。第二,机制,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伊斯特林悖论? 如何理解伊斯特林悖论? 后一个问题构成了本文分析的核心,本文将利用中国的数据,通过分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尝试将伊斯特林悖论整合起来,推进对于幸福感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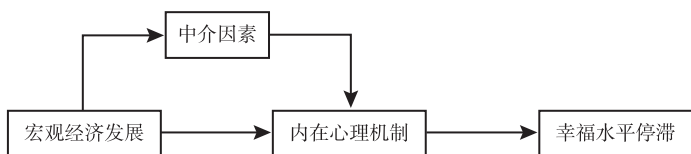
关于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为人熟知,这里拟不再赘述。然而,已有的理论解释大多是基于单一因素的、静态的、宏微观割裂的解释,相互之间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动态多维的研究框架,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多层、多元因素进行历时性与综合性的分析,以期运用这种多元分层动态的幸福感研究范式推进对伊斯特林悖论形成机制的研究。

① 伊斯特林所研究的时间段为 1990 - 2010 年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其所用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WVS)、盖洛普数据的结果均显示出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变化趋势,并且 WVS 数据的拐点在 2000、2001 年左右。刘军强等人所研究的时间段以 2000 年为起点,数据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始终呈上升态势,这与伊斯特林研究中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盖洛普调查以及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在 2000 年后的数据结果基本相符,并无二致。因此,从长期来看,伊斯特林悖论在中国是成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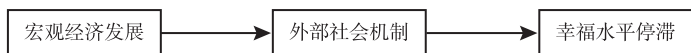
二、相关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受西方功利主义学派、古典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家一直将幸福视为财富最大限度的积累。只要社会能够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那么个体自然会实现幸福的目标。然而,随着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传统的经济学幸福观不断招致非议。尤其是在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悖论并得到多国经验数据的支持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均开始深入反思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致力于揭开幸福悖论之谜。目前关于伊斯特林悖论现象的诸多理论解释,可以归结为两大解释路径,如下图所示。

解释路径一



解释路径二



关于伊斯特林悖论的两种解释路径

(一)解释路径一:内在心理机制

第一种解释路径将伊斯特林悖论的成因归结于个人内在的心理机制,认为由于某些先天性的心理因素的作用,使得宏观经济的发展无助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这种解释路径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间接心理机制与直接心理机制两种类型。

1. 间接心理机制

间接心理机制认为,宏观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某些中介因素的变化,进而诱发了某种心理机制,阻碍了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这种解释类型以相对收入理论为代表。

“相对收入假说”最早由杜森贝利(J. S. Duesenbery)提出,后被伊斯特林引用,作为对幸福悖论形成机制的一个可能的解释。该理论指

出,个人的幸福感不仅仅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由于人们普遍具有社会比较的心理,所以主观幸福感更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的高低。收入的增加固然能够提升幸福感,然而当所有人的收入同时提高时,在相对水平上便意味着个体的收入并无增长,从而使得个体在心理上并不会感受到收入增长的刺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宏观层面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没能带来国民平均幸福感的提升(Easterlin, 1974; Asadullah et al., 2016)。

韦胡文等人质疑伊斯特林悖论的正确性,自然也不承认相对收入论的合理性。韦胡文对相对收入论提出了三点批评,^①指出个体的幸福感建立在人类需求满足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天生的、绝对的情感,并不受相对标准的影响(Veenhoven, 1991)。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支持(Diener et al., 1993; Bjørnskov et al., 2008; Di Tella et al., 2003; Di Tella & MacCulloch, 2008; Madden, 2011; Sacks et al., 2012; Stevenson & Wolfers, 2013)。

在中国的幸福感研究中也同样出现了关于相对收入理论的争论。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相对收入地位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纯影响则会因参照群体收入的增长而削弱,支持了相对收入理论(奈特,2014;官皓,2010;张学志、才国伟,2011; Asadullah et al., 2016; Li, 2016)。

然而,仍有一些实证研究对相对收入理论提出了质疑。例如,罗楚亮通过研究发现,绝对收入与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绝对收入的影响依然显著(罗楚亮,2009)。刘军强等人的研究也显示,个人的绝对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稳定的正向作用(刘军强等,2012;边燕杰、肖阳,2014; Bian et al., 2015)。

相对收入理论的确可以为早期的伊斯特林悖论提供一个可能的答案,然而除了韦胡文等人对“相对标准”的批评之外,其自身的解释逻辑也存在缺陷。依照相对收入理论的观点,宏观的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因而从历时角度看,一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似乎永无增长的可能性,这显然与伊斯特林悖论修正后的结果不相符合。导致这一缺陷的根本原因,是相对收入理论没有考虑到影响居民

^① 这三点批评包括:第一,幸福是个人自我需求的满足,与他人无关;第二,幸福的标准由人性的需求决定,并不会发生变动;第三,比较的标准只是异想天开,并不是人的真实需要。

主观幸福感的微观机制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因而未能建立起包含宏微观结果的完整逻辑结构,容易陷入幸福永无增长的极端误区。

除此之外,国内的许多研究在考察相对收入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时,存在着某些方法上的缺陷。例如,对相对收入变量的测量并不恰当。相对收入应是个体收入与其参照群体收入的差值或比值,是相对客观的指标。因而,用主观的评价来测量是不合适的。^①

2. 直接心理机制

直接心理机制强调个体的心理因素对伊斯特林悖论现象的直接效应,以适应理论与幸福饱和理论为代表。适应理论认为,人们的心理通常会根据外界的刺激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从而使其主观情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因此,这种心理的适应性特征可以减少个体对不断出现的刺激的反应能力(弗雷、斯塔特勒,2006:13)。

根据适应理论的解释逻辑,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专门针对幸福感研究的理论——快乐踏水车理论和定点理论。快乐踏水车理论(又称抱负理论)认为,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个体的物质欲望也会不断地增强,由此便会使其逐渐适应收入增加的现实,而降低由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幸福感(Brickman & Campell, 1971; Knight, 2012; Tsutsui & Ohtake, 2012)。

定点理论认为,基因、人格、气质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都拥有一条恒定的幸福基准线。当外界的环境和生活事件发生变化时,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会围绕着幸福基准线上下波动。然而,当情绪系统根据新的情境进行调控后,幸福感便会重新回归基准线。因此,所谓的幸福与否,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情感反应(Lykken & Tellegen, 1996; Cummins, 2011)。

适应理论从个体的直接心理机制出发,为伊斯特林悖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然而其理论本身仍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其一,适应理论在方法论上陷入了个人主义的误区,认为个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只能通过微观层面的感知调适来实现。其二,由于难以对个体的心理状

^① 目前许多国内的学者将相对收入操作为“与周围人相比,您的收入水平如何”,这种方法测量的只能是“相对剥夺感”,而不是相对收入。伊斯特林所说的相对收入是用个体的收入减去社会平均收入的差值。

态进行长期的跟踪式测量,并且无法排除其他情境性因素对于个体心理变化的影响,因此针对适应理论的经验性支持较为薄弱。其三,尽管适应理论在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但是其自身也未能克服单因素分析的弊端。

除了适应理论之外,另一种较为流行的直接解释机制便是幸福饱和理论。幸福饱和理论认为,收入对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符合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因此,当收入的边际效用为零时,个体便达到了“幸福的饱和点”(happiness satiation point),过了饱和点之后,收入便不再与个人的幸福感相关(Diener et al., 1993; Diener & Biswas-Diener, 2002; Clark et al., 2008; Proto & Rustichini, 2013; Liang & Shen, 2016)。与幸福饱和理论相似,收入门槛(income threshold)理论也认为,个体的收入水平存在着一个门槛,越过了这道门槛后,收入的增长便与其主观幸福感无关(Layard, 2003, 2005; Diener & Seligman, 2004; Di Tella & MacCulloch, 2008)。

幸福饱和理论与收入门槛理论基于边际效用递减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力图从微观层面解释伊斯特林悖论中的历时效应。然而这种解释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其一,仅限于微观个人层次的讨论,而没有将其置于宏观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因此用其来解释伊斯特林悖论的宏观结果不免有些牵强。其二,如果将幸福饱和点的逻辑推广到宏观的层次,则经济发展与国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应呈现“厂”字型或倒U型的变化趋势。而伊斯特林等人的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正U型或波浪型(Easterlin et al., 2010, 2012; Ma & Zhang, 2014),与该推论不符。其三,与相对收入理论和适应理论一样,幸福饱和理论也是一种单因素的解释进路。

总之,解释路径一中所论及的两种心理机制,均倾向于一种消极的“天命”式的理论取向(丘海雄、李敢, 2012),认为个体先天的心理机制决定了其主观幸福感只能维持在特定的水平,而任何社会政策方面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

(二)解释路径二:外在社会机制

不同于解释路径一,解释路径二将个人的心理因素排除在解释链条之外,而强调宏观经济发展的附带效应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这种解释路径认为宏观经济发展本身能够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

感,也即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则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附着某些社会因素的变化,而正是这些附带效应限制了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解释路径二以遗漏变量理论为代表。该理论认为,个人收入的增长固然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然而收入增长同时也导致了工作时间的增加、身体健康的恶化等,这些潜在因素可能会降低收入增长的幸福效用。

迪纳与塞利格曼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国家富裕水平的攀升,居民幸福水平的变化便越来越取决于收入之外的非经济因素,包括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政府的民主程度、公民权利,以及工作层面的工作满意度与工作收益率等(Diener & Seligman, 2004)。依据遗漏变量理论的逻辑,迪特拉与麦卡洛克将闲暇、犯罪率等非收入因素纳入模型,对12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居民幸福感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引入非经济因素的变量,反而加剧了“收入增长而快乐无增加”的悖论(Di Tella & MacCulloch, 2008)。此后,又有学者讨论了社会资本、环境污染、工作时间、婚姻、就业状况、社会保障、城市化等因素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Helliwell & Putnam, 2004; Di Tella et al., 2003; Bjørnskov et al., 2005; Dockery, 2005; Graham, 2006; Hudson, 2006; Chan & Yao, 2008; Smyth et al., 2008; Welsch, 2006; Luttmer, 2005; Pouwels et al., 2008)。

遗漏变量理论拓宽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视野,为解释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开辟了新的途径,然而该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一,遗漏变量理论原本试图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非经济因素切入来解答伊斯特林悖论,然而却逐渐脱离了悖论本身的框架,转而变为讨论某个或某几个变量对于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使得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逐渐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其二,鉴于各地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与内在心理机制相比,遗漏变量理论更不易探索出一种能够解释悖论的一般化程式。其三,尽管遗漏变量理论体现了多因素的分析取向,但因为难以厘清各因素与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所以绝大部分遗漏变量研究均采用的是静态的分析框架,由此一来,便无法为幸福感的变化趋势提供可靠的解释。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伊斯特林悖论产生机制的解释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一是单一因素分析与静态解释。以往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它

们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伊斯特林悖论提出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因此,无法从根源上还原伊斯特林悖论形成的机制。特别是相对收入理论和适应理论,均将伊斯特林悖论的成因归结于单一的收入或心理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主观幸福感是多层、多元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留下了诸多未被解释的变化差异。遗漏变量理论尽管为主观幸福感的多因素分析提供了空间,然而失之于未能厘清各因素随宏观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与个体收入增长的对应关系,因此难以合理地解释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变化趋势。

二是宏微观机制相分离。上文提及,伊斯特林悖论包含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的命题,二者分别探讨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与个体层面的收入水平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尽管这两个命题的结论相悖,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个体的收入水平休戚相关,这也是悖论得以成立的前提。因此,若想解释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不能忽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微观机制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而已有的对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要么单纯地从微观机制出发来讨论宏观层次的结果,如解释路径一中的相对收入理论、适应理论与幸福饱和理论;要么将悖论的微观结果置之不理,仅分析宏观变量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抑制效应,如遗漏变量研究中关于失业率、通货膨胀等宏观因素如何导致“幸福停滞”现象的讨论。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均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宏微观机制割裂开来,因此没有建立起包含宏微观结果在内的完整逻辑结构。

鉴于上述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力图运用一种多元分层动态的幸福感研究范式,在一个多维的分析框架中,以影响幸福感的多维变量和宏、微观机制以及微观基于宏观的条件效应为对象,最终建立起整合该悖论的逻辑链条,对该悖论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解释。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三个基本社会变量

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社会财富迅速积累,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物质丰裕的背后却隐匿着严峻的社会问题。1958年,加尔布雷思对丰裕社会的反思直

接推动了学界对“唯物主义”、“唯 GDP 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幸福”和“生活质量”的倡导,构成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主观幸福感研究兴起的原始背景(加尔布雷思,1965:68)。

同样,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伊始,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开始快速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解决了温饱问题,居民的迫切需求逐步脱离了基本生存的层次,向着更高层次的需求转型升级(张翼,2016)。然而,不可否认,中国持续了近 4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尽管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7 年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 0.465。^①

综上所述,无论是伊斯特林悖论的历史本源,还是中国社会的时代情境,都表明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两个伴随效应:其一,微观层面的个体心理变化,即物质生活的富足使得人们的迫切需求由基本物质型向发展需求型转向;其二,由于新增财富分配不均等,全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由此,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及两种伴随效应总结为三个基本的社会变量:一是宏观经济的发展,二是个人需求的转型,三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本文认为,这三个基本变量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伊斯特林悖论形成的基础,在根本上决定了国民幸福感变化的完整图式及其内在逻辑。^②

(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多元因素

上述三个基本社会变量构成了本文分析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为宏观经济因素,即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的收入水平,而且有利于改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的供给以及住宅、交通、通讯、能源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诸如此类的事项都是所有国民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此外,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能够促进行业与职业的多样性,提高居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1/t20170120_1456268.html)。

② 伊斯特林及其支持者发现了 20 世纪 40-60 年代美国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升,但却将这种现象归因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降低了个体收入的相对水平,并没有考虑到在丰裕社会到来的背景下,人们获取幸福回报的微观机制正由增加物质财富转向为提高精神享受,也没有考虑到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负效应。

民的就业水平,满足民众的安全需求,提升该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这些均有助于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由此可以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宏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

第二个维度为微观个体因素。主观幸福感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和认知,而它的重要来源之一便是个体的需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主观幸福感就是个人对需求满足程度的一种认知评价或情感反应。

人的需求虽然纷繁多样,但却不是杂乱无章的。心理学家通过系统地研究发现,人类的需求具有层次性的特征(Lewin, 1936; McClelland & Clark, 1949; Alfderfer, 1972)。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更是直接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阶梯式的层次,构建起较为系统和完善的需求层次论(Maslow, 1943)。

从发展的角度,可以将人的需求分为生存型需求、发展享受型需求以及更高层次的超越型需求(马克思,1961;莫文,2013;张翼,2016)。所谓生存型需求主要指与个体基本物质生活相关的需求;发展享受型需求主要指脱离了基本物质需要,而渴望精神层面的富足与享受的需求;超越型的需求是一种衍生性的需求,类似于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多指个人对真善美等人生境界的需求。

需求本身的多重性决定了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同样具有多元性和综合性的特征。而需求的分层性,则意味着影响幸福感的诸要素在不同需求层次的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参照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①我们认为那些能够满足个体当前需求的要素具有更高的相对重要性,从而享有更高的幸福回报。当个体的需求位于基本物质的层次时,与物质财富密切相关的要素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相对重要因素”,具有较高的幸福回报;而当个体的迫切需求转为发展享受层次时,物质财富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下降,幸福回报降低,而那些与精神享受和发展紧密相连的生活品质变量则占据了相对重要地位,享有更高

^① 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可以表述如下: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那些需求较高的因素(资本、技术)在国际分工中的收入回报高,相反那些需求较低的因素(原材料、劳动力)的收入回报较低。

的幸福回报。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2。

假设2:物质地位对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物质地位越高,幸福感越强。生活品质对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活品质越高,幸福感越强。

第三个维度为社会结构因素,即社会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之后,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分析对象逐渐由微观的个体行为转向更为宏观的社会情境。其中,最为主流的研究是从集体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来审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不同,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支持者较少关注微观层面的收入增减,而是致力于分析物质财富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集散程度,也即全社会收入不平等结构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黄嘉文,2016)。

关于全社会收入不平等结构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两种竞争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削弱居民的幸福感。社会学家朗西曼提出,当人们与其参照群体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时,就会产生一种受到剥削的负面心理,即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当收入成为比较的对象时,收入差距的扩大无疑会增强居民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对其幸福感水平产生消极影响(Runciman, 1972)。

然而,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不但不会损害居民的幸福水平,反而对其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提出了“隧道效应”理论来说明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正向效应(Hirschman, 1973)。^①当周围人的收入增加时,个人便会对自己的收入水平产生良好的预期,从而使幸福感得以提升。该效应在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国家得到了经验资料的支持(Caporale et al., 2009)。

由此,可以提出以下竞争性假设。

假设3.1:收入差距对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收入差距越大,幸福感越低(相对剥夺效应假设)。

假设3.2:收入差距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差距越大,幸福感越强(正向隧道效应假设)。

^① 赫希曼做了一个类比,在一个拥堵的隧道中,尽管自己所在的列车停滞不前,但是如果看到旁边的列车开始移动,那么就表示前方的路段情况好转,自己的车也即将脱离困境。

(三) 宏观、微观因素的条件效应作用与动态分析

由伊斯特林悖论现象所根植的三个基本社会因素可知,上述三个维度的因素之间并不是割裂的。就宏观经济因素与微观个体因素的关系而言,宏观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使得个体的需求逐渐由生存型需求转向发展享受型需求。根据需求层次论的逻辑,当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个体的迫切需求便会向上位移,从而使得高层次的需求激励增加,而较低层次需求的激励效用减小。

需求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基础和来源,如果个体的需求层次发生变化,其获取主观幸福回报的微观机制自然也会随之改变。当个体的迫切需求位于物质型层次时,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会显著地增强其主观幸福感;而当物质型需求得到满足,个体的迫切需求上移至发展享受型需求时,由物质财富增长所带来的幸福回报便会日渐衰减,而有助于个人发展与享受的休闲娱乐等因素则会显著地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对应上文提出的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类比,我们可以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微观个体因素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表述为:随着宏观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型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而发展享受型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不断增强,个体所对应的微观幸福回报机制逐渐由社会经济地位向生活品质转向。由此,可以提出假设4。

假设4:伴随着宏观经济的发展,物质地位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会逐步减弱,生活品质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会逐渐增强。

宏观经济因素与社会结构因素之间同样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宏观经济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且也代表着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认为,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职业结构更新、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分工变化、教育普及等一系列社会变迁,从而使得社会流动率不断提高,流动机会更加平等。社会机会结构开放性的提高增强了社会成员在资源获取机会上的平等程度,使得居民对未来产生乐观的预期,削弱了相对剥夺效应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作用,从而有利于隧道效应的产生。由此可以推论,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提高社会机会结构的开放性,进而提高社会不平等的幸福回报。

然而,社会封闭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不同,认为社会中既有的优势阶层会利用其在资源和机会获取方面的优势来维持自身的阶层特权(韦伯,2005),因此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实现阶层的再生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结构趋于封闭。拉夫特瑞与豪特研究了教育扩张过程中教育机会

的分配,发现优势地位群体会利用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垄断由教育扩张所创造的新的教育机会,维持教育的阶层不平等(Raftery & Hout, 1993),这一观点被称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MI假设)。根据上述理论的逻辑可以推论,尽管宏观经济的发展可以创造新的流动机会,但由于阶层封闭和排斥的作用,社会的结构趋于固化和封闭。由此一来,不但阻碍了隧道效应的出现,而且会进一步加剧各阶层之间的相对剥夺效应,从而降低社会不平等的幸福回报。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下述竞争性假设。

假设 5.1:宏观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高社会不平等的幸福回报(工业化假设)。

假设 5.2:宏观经济的发展会降低社会不平等的幸福回报(社会封闭假设)。

四、研究方法

(一)数据介绍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的方法,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省级行政单位共抽取100个县、480个村/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抽取25户家庭,利用KISH表在每户家庭中抽取1人进行调查,最后所获得的总样本量约为12000。

(二)变量介绍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居民自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测量问题为:“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下设“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五个选项,分别赋以1-5的分值,分值越高,表示被调查者越幸福。

2. 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分为四个部分: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生活品质变量以及社会不平等变量。宏观经济水平即为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依照以往研究的惯例,本文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操作化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GDP)。由于缺乏纵向调查数据,很难用历时的人均 GDP 数据拟合出国家经济水平的长期变化,因此本文尝试以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来模拟长时期的历史变迁进程,利用 2010 年 CGSS 所调查的 100 个县或县级市在 2010 年的人均 GDP 数值作为宏观经济发展程度的测量指标。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因而可以很好地契合经济发展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

社会经济地位是对个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综合衡量,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相较于他人的位置高低(李春玲, 2005)。本文所要研究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包含以下两个变量:个人收入和教育程度。收入变量为个人在一年之中绝对收入的对数值,教育程度变量为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

本文所讲的生活品质偏重于精神上的享受,因而用以下两个变量来测量居民的生活品质:参加高品质休闲娱乐活动的频率与文化休闲娱乐支出。

根据既有研究所建构的指标体系,高品质休闲娱乐的测量指标为:“在过去的一年中参加音乐会、展览、看演出等文化活动的频率”,指标的取值在 1-5 之间,其中 1 表示“从不”,2 表示“一年数次或更少”,3 表示“一月数次”,4 表示“一周数次”,5 表示“每天”。数值越大表示参加高品质休闲娱乐的频率越高。文化休闲娱乐支出的测量指标为被访者过去一年中在文化休闲娱乐方面支出的对数。

社会不平等的变量为样本县市在 2010 年的收入基尼系数,通过 Stata 计算获得。

此外,本文还设置了一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党派、年龄、婚姻状态、民族、户籍状况等,与自变量一起纳入回归模型。详细的变量信息如表 1 所示。

(三)模型介绍

本文的数据结构包含两个层级,即微观层面的个人属性变量与宏观层面的县级经济发展水平变量。依据本文的解释框架,区域宏观经济的发展提升了该区域内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使得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各要素在个人获取幸福回报上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导致了社会不平等加剧。微观层级的变量嵌套于宏观层级的变量之中,因此在统计方法上采用分层线性模型来研究宏微观变量对于主观幸福

表 1

相关变量描述统计表

N = 9102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说明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3.78	.88	最小值 = 1, 最大值 = 5
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教育程度	8.39	4.84	最小值 = 0, 最大值 = 19
收入对数	8.35	2.97	最小值 = 0, 最大值 = 14.85
生活品质变量			
高品质娱乐活动	3.43	1.73	最小值 = 2, 最大值 = 10
休闲娱乐支出(对数)	1.90	1.56	最小值 = 0, 最大值 = 11.51
结果不平等变量			
收入基尼系数	.43	.84	最小值 = 0.25, 最大值 = 0.76
宏观经济水平变量			
县级人均 GDP	3.66	2.30	最小值 = 1, 最大值 = 5
控制变量			
性别	.49	.50	女 = 0, 男 = 1
年龄	47.76	15.13	最小值 = 19, 最大值 = 98
年龄的平方/100	27	15.68	最小值 = 4, 最大值 = 92.16
婚姻状态	.86	.35	单身 = 0, 已婚 = 1
宗教信仰	.13	.33	不信仰宗教 = 0, 信仰宗教 = 1
民族	.91	.29	少数民族 = 0, 汉族 = 1
党派	.13	.34	非中共党员 = 0, 中共党员 = 1
户籍	.47	.50	农村户口 = 0, 城镇户口 = 1

感的影响以及微观机制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层 1：

$$Y_{ij} = \beta_{0j} + \sum_{k=1}^p \beta_{kj} X_{kij} + r_{ij}$$

层 2：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 W_j + \mu_{0j}$$

$$\beta_{kj} = \gamma_{k0} + \sum_{k=1}^p \gamma_{k1} W_j + \mu_{kj}$$

层级混合效应：

$$Y_{ij} = \gamma_{00} + \gamma_{01}W_j + \mu_{0j} + r_{ij} + \sum_{k=1}^p (\gamma_{k0} + \gamma_{k1}W_j + \mu_{kj})X_{kij}$$

其中, X_k 为模型中微观层次的解释变量, 包括教育、收入、休闲娱乐、文化休闲娱乐支出等。 W_j 为宏观层次的解释变量, 即县级人均 GDP。

根据 HLM 的零模型, 将幸福感的差异进行分解, 结果如下。

表 2 分层级分解幸福感差异

固定效应	系数	标准误			
幸福感	3.785	.021			
随机效应	方差成分	占总方差份额	标准误	卡方	P 值
层级 1(个体间)	.208	19.49%	.016	460.42	.000
层级 2(县市级间)	.858	80.51%	.006		

由表 2 中的方差成分可知, 组内方差为 0.858, 组间为 0.208, 卡方值为 460.42, p 值接近于 0。由此可知, 幸福感在县级市间的差异十分显著。根据方差成分在两个层级间的分布, 我们可以计算出, 区域层次的效应比例为 19.49%, 个体层次的效应比例为 80.51%, 也即因地区不同而造成的个体幸福感差异占到了个体幸福感总体差异的 19.49%。因此在本研究中使用多层次模型是合适的。

五、分析策略与数据结果

基于伊斯特林悖论所根植的三个基本社会因素,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旨在探索中国幸福悖论形成机制的多元分层动态的幸福感研究范式。为了便于分析与解释, 本文首先以居民需求转型的背景为基础, 探索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微观机制, 并通过考察微观机制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来分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其次, 以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为基础, 探索社会不平等因素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同时将社会不平等纳入更为宏大的动态背景之中, 即考察社会不平等因素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是否会随着宏观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以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模型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三种基本社会要素与主观幸福感

N = 9102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微观层次变量					
截距项	4.025 ***	3.851 ***	4.003 ***	3.634 ***	3.470 ***
教育程度	.020 ***	.028 ***	.019 ***	.019 ***	.028 ***
个人年收入(对数)	.018 ***	.029 ***	.018 ***	.018 ***	.029 ***
高品质休闲娱乐活动	.023 +	.023 +	.019	.023 +	.010
休闲娱乐活动支出(对数)	.023 ***	.024 ***	.031 ***	.023 ***	.026 ***
社会不平等变量					
基尼系数	-.100	-.099	-.092	-.041	-.070
宏观层次变量					
人均 GDP	.018 +	.058 **	.009 +	.083 **	.134 ***
宏微观交互项					
教育程度 × 人均 GDP		-.003 *			-.003 *
个人收入 × 人均 GDP		-.003 *			-.003 *
高品质休闲娱乐活动 × 人均 GDP			.001		.000
休闲娱乐支出 × 人均 GDP			.002		.001
基尼系数 × 人均 GDP				-.184 **	-.190 **
控制变量					
性别	.094 ***	.097 ***	.094 ***	.094 ***	.097 ***
年龄	-.039 ***	-.039 ***	-.039 ***	-.039 ***	-.039 ***
年龄平方/100	.001 ***	.001 ***	.001 ***	.001 ***	.000 ***
婚姻状态	.264 ***	.262 ***	.264 ***	.264 ***	.262 ***
宗教信仰	.024	.025	.024	.025	.025
民族	-.068 +	-.070 +	-.067 +	-.066 +	-.07 +
党派	.122 ***	.125 ***	.121 ***	.121 ***	.124 ***
户籍	-.066 *	-.072 *	-.068 *	-.067 *	-.073 *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3 中的模型 1 为基准模型,包含了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生活品质和社会不平等四个维度的变量。由数据结果可知,人均

GDP、教育程度、个人的绝对收入、参加高品质娱乐活动的频率、文化休闲娱乐支出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可知,就宏观层次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显著地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结果支持了假设 1。就微观层次而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多、参加高品质休闲娱乐的频率越高、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支出越多则主观幸福感越强,表明物质地位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均可以显著地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水平,结果支持了假设 2。

测量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收入基尼系数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社会不平等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假设 3.1 与假设 3.2 没有得到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基尼系数变量的符号为负,表明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趋于降低。

模型 2 至模型 4 分别展示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生活品质变量与社会不平等变量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模型 5 为总模型。数据结果表明,在社会经济地位层面,宏观的经济增长会显著地削弱个人的教育程度和绝对收入对于幸福感的正效应。也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个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在生活品质方面,人均 GDP 与高品质休闲娱乐活动频率和文化休闲娱乐支出的交互项均不显著,但其系数为正,表明高品质娱乐活动和文化休闲娱乐支出对幸福感的正效应不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部分支持了假设 4。在社会不平等方面,人均 GDP 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收入差距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作用不断增强,结果支持了假设 5.2。值得注意的是,人均 GDP 变量的系数为 0.134,而其与收入基尼系数交互项的系数为 -1.90,表明社会不平等程度会消除由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居民幸福感。

此外,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显示,男性、已婚者、中共党员、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更强。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 U 型变化趋势,表明青少年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中年人的幸福感水平较低。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2010 年 CGSS 的数据,以中国为例,将伊斯特林悖论置于宏观经济增长、居民需求转型以及社会不平等三重背景之下,运用一

种多元分层动态的幸福感知研究范式,探讨了该悖论的形成机制和解释逻辑。总结如下:

在微观层面,物质地位的提高能够显著地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这一结果与伊斯特林悖论中的微观命题相吻合。生活品质对幸福感的正效应也相继得证。在宏观层面,区域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地提升居民的幸福感知水平,这点与幸福悖论的宏观命题相矛盾。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伊斯特林悖论宏观命题中的“幸福无增长”并不是经济发展本身所致。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干扰了宏观的经济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微观机制基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条件效应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解释。据模型显示,物质地位提升所带来的幸福回报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递减,也即物质需求的满足正逐渐失去其对个体效用的激励作用。在生活质量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高品质休闲娱乐活动与文化休闲娱乐支出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正效应并不会受到影响。由此可知,居民需求在由物质型向发展享受型转变时,物质型变量在幸福回报上的相对重要性不断下降,幸福回报率降低;而生活品质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不变或有上升的趋势,幸福回报率趋于增加。

在社会不平等方面,中国的数据结果显示,社会不平等本身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但相对剥夺效应确实是存在的。表现在社会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并全部消除了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幸福回报。因此,尽管在市场转型的初期,社会机会结构的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国民对未来收入的良好预期,然而所谓的“隧道效应”并没有在中国出现。相反,由社会不平等所引发的“相对剥夺效应”严重地降低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除此之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间,尽管中国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工业化与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社会的机会结构相对封闭(李路路、朱斌,2015),宏观经济增长非但未能推动隧道效应的出现,反而对相对剥夺效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社会不平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效应进一步加剧。

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发展引发居民需求升级与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一方面,需求层次的变化不断地削弱个人的物质地位对于提升主观幸福感的相对重要性,导致其幸福回报不断下降;另一方面,由

社会不平等加剧所导致的相对剥夺效应,显著地降低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上述二者的双重作用使得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显著提升,而是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出现了伊斯特林所描绘的“幸福悖论”现象。

上述结论同样有助于理解在其他国家中所出现的伊斯特林悖论现象。有研究表明,尽管不同的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影响各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却具有跨国的一致性(Sarracino, 2010)。因此,由中国的伊斯特林悖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般性的解释意义。

首先,不同于相对收入理论、适应理论与幸福饱和理论,我们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多层次、多维度的,这一点应成为理解伊斯特林悖论形成机制的基础。多元分层的幸福感研究范式不仅可以回应伊斯特林悖论在研究方法上所遇到的生态相关(ecological correlation)、参照类(reference class)和第三变量等问题(Ma & Zhang, 2014),而且也更加符合经验现实。

其次,尽管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多元分层的,但是各维度因素在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上的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作为主观幸福感基础的需求具有分层和动态的特征,因而影响主观幸福感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需求类型的变动而发生转变。与已有的理论解释相比,这种相对重要性的解释路径更具有灵活性和普遍性。就长期性和一般性而言,个体的需求遵循层次论的模式转型升级,使得物质财富因素在幸福回报上的相对重要性不断下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短期性的事件仍然会引起需求的暂时变动,进而影响各种幸福影响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例如,一些消极事件会引起某些幸福影响要素出现短暂性稀缺,从而提升该要素在增强主观幸福感上的相对重要性地位,而物质财富等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会在短期内下降。因此,在这一时期,尽管宏观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增强,甚至会出现断崖式下降(Ma & Zhang, 2014)。

除了微观层次的要素之外,社会结构性的要素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具有显著的影响。社会不平等可以分为结果的不平等与机会的不平等两部分,结果的不平等即社会贫富差距,而机会的不平等则指涉资源分配与获取过程上的不平等。尽管有许多研究支持了隧道效应,表明合理的社会不平等差距有助于隧道效应的产生,但本文的研究表明,

隧道效应是以机会的平等或是开放的社会结构为前提的。如果社会结构趋于封闭,那么社会不平等更可能导向相对剥夺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处于社会结构不利位置的居民所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越强,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其主观幸福水平。

本文的研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方法,尽管已被一些研究证明是有效的(Sacks et al., 2013),但仍有研究表明空间层面的经济发展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要小于时间层面的经济发展(Zhou & Xie, 2016)。此外,囿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在许多变量的测量上不太准确,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够有所改进。

参考文献:

- 边燕杰、肖阳,2014,《中英居民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弗雷,布伦诺·阿洛伊斯·斯塔特勒,2006,《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静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官皓,2010,《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收入和相对地位》,《南开经济研究》第5期。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11,《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黄嘉文,2016,《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社会》第4期。
- 加尔布雷思,约翰,1965,《丰裕社会》,徐世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春玲,2005,《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路路、朱斌,2015,《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2012,《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罗楚亮,2009,《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财经研究》第5期。
- 马克思,1961,《雇佣劳动与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 莫文,2013,《生存型、发展型、超越型主观幸福感测评工具的研制与应用》,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奈特,约翰,2014,《经济增长会提高中国人的幸福感吗?》,《国外理论动态》第5期。
- 丘海雄、李敢,2012,《国外多元视野“幸福”观研析》,《社会学研究》第2期。
- 韦伯,马克斯,2005,《开放的和封闭的体系》,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北京:华夏出版社。
- 吴菲,2016,《更富裕是否意味着更幸福?——基于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2003-2013)》,《社会》第4期。
- 邢占军,2011,《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张学志、才国伟,2011,《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管理世界》第9期。
- 张翼,2016,《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倾向——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社会学研

究》第4期。

- Alderfer, C. P. 1972, *Existence, Relatedness, and Growth: Human Needs in Organization Settings*. New York: Free Press.
- Asadullah, M. N., S. Xiao & E. Yeoh 2016,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2005 - 2010: The Role of Relative Income, Gender, and Location." *IZA Discuss Paper* 9637.
- Bian, Y. J., L. Zhang, J. Yang, X. Guo & M. Lei 2015,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People: A Multifaced View."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1(1).
- Bjørnskov, C., N. D. Gupta & J. Pedersen 2005, "What Buys Happiness? Analyzing Trend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15 European Countries, 1973 - 2002." *Iza Discussion Papers* 9(2).
- 2008, "Analysing Trend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15 European Countries, 1973 - 2002."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9(2).
- Brickman, P. & D. T. Campbell 1971, "Hedonic Relativism and Planning the Good Society." In M. H. Appley (ed.), *Adaption Level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rickman, P., D. Coates & R. Janoff-Bulman 1978, "Lottery Winners and Accident Victims: Is Happiness Rela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8).
- Brockmann, H., J. Delhey, C. Welzel & H. Yuan 2009, "The China Puzzle: Falling Happiness in a Rising Econom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0.
- Caporale, G. M., Y. Georgellis, N. Tsitsianis & Y. P. Yin 2009, "Income and Happiness across Europe: Do Reference Values Matter?"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0(1).
- Chan, C. K. & X. Yao 2008, "Air Pollution in Mega Cities in China."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42.
- Clark, A. E., P. Frijters & M. A. Shields 2008,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1).
- Cummins, R. A. 1998, "The Second Approximation to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Life Satisfac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43.
- 2011, "Comparison Theory in Economic Psychology Regard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Decreasing Marginal Utility: A Critique."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6(3).
- Deaton, A. 2008, "Income, Health and Wellbeing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the Gallup World Poll."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2).
- Di Tella, R., R. J. MacCulloch & A. J. Oswald 2003, "The Macroeconomics of Happines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5.
- Di Tella, Rafael & Robert MacCulloch 2005, "Partisan Social Happiness." *Ze Working Papers* 72(2).
- 2008, "C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s an Answer to the Easterlin Paradox."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6(1).
- Diener, E., E. Sandvik, L. Seidlitz & M. Diener 199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lative or Absolut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8(3).
- Diener, E. D., M. Diener & C. Diener 1995, "Factors Predi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5).

- Diener, E. D., E. M. Suh, R. E. Lucas & H. L. Smith 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2).
- Diener, E. D. & R. Biswas-Diener 2000, "New Direction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 The Cutting Edge." *Ind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7.
- 2002, "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Guide to Needed Researc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7.
- Diener, E. D. & M. E. P. Seligman 2004, "Beyond Money: Toward an Economy of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5(1).
- Dockery, A. M. 2005, "The Happiness of Young Australian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Labour Market Experience." *Economic Record* 81.
- Easterlin, R.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aul A. David & 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95,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7(1).
- 2001,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111(473).
- 2005, "Feeding the Illusion of Growth and Happiness: A Reply to Hagerty and Veenhove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4(3).
- Easterlin, R., L. A. McVey, M. Switek, O. Sawangfa & J. S. Zweig 2010,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52).
- Easterlin, R. A., R. Morgan, M. Switek & F. Wang 2012,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00 – 2010."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25).
- Graham, C. & A. Felton 2006,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Insights from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4(1).
- Helliwell, J. F. & R. D. Putnam 2004, "The Social Context of Well-be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359.
- Hirschman, A. O. & M. Rothschild 1973, "The Changing Tolerance fo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Mathematical Appendix by Michael Rothschil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4).
- Hudson, J. 2006, "Individual Trus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the EU." *Kyklos* 59(1).
- Inglehart, R., R. Foa, C. Peterson & C. Welzel 2008,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Rising Happiness: A Global Perspective (1981 – 2007)."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 Layard, R. 2003, "Happiness: Has Social Science a Clue?" *Lionel Robbins Memorial Lectures* given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ondon, March 3rd – March 5th.
- 2005, *Happiness: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London: Penguin.
- Lewin, K. 1936, "Some Social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4).
- Li, J. 2016, "Why Economic Growth did not Translate into Increased Happiness: Preliminary

- Results of a Multilevel Modeling of Happiness i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8(1).
- Li, J. & J. W. Raine 2014, “The Time Trend of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6 (2).
- Liang, Y. & J. Shen 2016,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urvey Data.” *Research in Applied Economics* 8(3).
- Luttmer, E. F. P. 2005, “Neighbors as Negatives: 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
- Lykken, D. & A. Tellegen 1996, “Happiness Is a Stochastic Phenomen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7(3).
- Kahneman, D. & A. B. Krueger 2006,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
- Knight, J. 2012,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Human Lot.” *PNA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25).
- Knight, J. & R. Gunatilaka 2011, “Does Economic Growth Raise Happiness in China?”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9.
- Ma, Y. Z. & Y. Zhang 2014, “Resolution of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9(2).
- Madden, D. 2011, “The Impact of an Economic Boom on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reland, 1994 – 2001.”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2(4)
- Maslow, A. H. & C. D. Green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1).
- McClelland, D. C. & R. A. Clark 1949, “The Projective Expression of Needs; The Effect of the Need for Achievement of Thematic Appercep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9(2).
- Myers, D. G. 2000, “The Funds, Friends, and Faith of Happy Peopl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1).
- Proto, E. & A. Rustichini 2013,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DP and Life Satisfaction.” *PLoS One* 8(11).
- Pouwels, B. , J. Siegers & J. D. Vlasblom 2008, “Income, Working Hours, and Happiness.” *Economics Letters* 99.
- Raftery, A. E. & M. Hout 1993,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 – 75.”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6(1).
- Runciman, W. G. 1972,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 Sacks, D. W. , B. Stevenson & J. Wolfers 2012, “The New Stylized Facts about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motion* 12(6).
- Sarracino, F. 2010, “Determina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High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 Do Happiness Equations Differ across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42.
- Smyth, R. , V. Mishra & X. Qian 2008, “The Environment and Well-being in Urban China.” *Ecological Economics* 68.

- Stevenson, B. & J. Wolfers 2008, “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 2013,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come: Is There Any Evidence of Sati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3).
- Tsutsui, Y. & F. Ohtake 2012, “Asking about Changes in Happiness in a Daily Web Survey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63(1).
- Veenhoven, R. 1991, “Is Happiness Relativ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4(1).
- 1994, “Is Happiness A Trait? Tests of Theory That a Better Society Does Not Make People Any Happier.”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2(2).
- 1996, “Happy Life-Expectancy: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Quality-of-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9(1).
- Veenhoven, R. & M. Hagerty 2006, “Rising Happiness in Nations 1946 – 2004: A Reply to Easterli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9(3).
- Walsh, B. 2012, “Adjusting to the Crisis: Well-being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Ire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appiness and Development* 1(1).
- Welsch, H. 2006, “Environment and Happiness: Valuation of Air Pollution Using Life Satisfaction Data.” *Ecological Economics* 58.
- Wilson, W. 1967,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7(4).
- Zhou, J. & Y. Xie 2016 “Do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ffect Life Satisfaction? A Spatial-Temporal Contextual Analysis in China.”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7(2).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石磊)

责任编辑:闻翔